



电子阅读改变了什么

何亦聪

自书籍诞生以来，“重量”就是一个困扰无数读书人的问题，倘若细心查考相关史料，几乎可以撰写出一部有趣的“书籍减重史”：从竹帛到纸书，从线装到胶装，从胶版纸到轻型纸，还有油墨重量，以及字体、排版对纸张的节约，等等。因为书籍的重量与体积难以忽视，所以，无论对古人还是对现代人来说，想要大量地收藏纸质书，都是一件颇考验财力的事情——不仅购置书籍耗费钱财，存放书籍的空间更是令人头疼。这就是电子阅读应运而生的前提。

据说电子阅读最早可追溯至1971年的“古腾堡计划”，到20世纪90年代，小说家王小波曾利用计算机技术设计过一个电子小说系统，但并未推广应用。电子阅读真正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大约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，我至今记得那个年代论坛里四散传播的种种简易格式的电子书，其中大部分都排版糟糕、错漏百出，但对一名藏书有限且没有书房的青年人来说，已是难得的精神财富。当时的笔记本电脑十分昂贵，在校学生也无力配备台式机，手机功能仅限于打电话、发短信，所谓“电纸书”更是未出现的事物。我的方法是在网吧用电脑将电子书导入一台大屏幕的电子辞典，以电子辞典的存储容量，一次足可导入三四十本。就是通过这台电子辞典，我在三四年的时间内读完了五六百本书，它仿佛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。

今天，电子阅读的普及度已无需多言，通过互联网书库订阅，大众读者也可坐拥万卷。当然，我们还会时会听到一种声音，这种声音认为，电子阅读将造成阅读的退化：人们在面对电子介质时，无法保持足够的专注，易受其他信息干扰；电子阅读的知识吸收是碎片化的，属于典型的“浅层阅读”；互联网书库过多的选择反而让读者在无所适从中虚度时光……纵观近百年的思想史，这样的论调其实并不稀奇，比如，早在1928年前后，历史学家傅斯年就曾提出一种“文学退化论”，他认为文字的发明使得上古时期那种口耳相传的文学形态趋于消泯，相比声音的文学，文字的文学是一种退化，它极大地折损了人类的性灵。再比如，在音声领域，也向来流行着数字音乐(CD、MP3)不如模拟音乐(黑胶、磁带)，流媒体音乐(在线播放)又不如数字音乐的论调，至今仍有许多“老烧”坚持听黑胶唱片。但是，每当面对这种论调，我就不免想起20年前的那台电子辞典——对于那些并不富裕又想大量读书的普通人而言，还有什么比电子阅读成本更低的方式呢？

因此，如果说电子阅读改变了什么，我并不想重复那些老生常谈：比如加强了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、利用了碎片化时间、增进了阅读场景的丰富性等。古人有“入厕读书”的种种趣谈，欧阳修读书有“三上”之说(马上、枕上、厕上)，电子阅读的普及当然也可为此提供便利。而我想说的，是“成本”二字。

去年我看了一则关于山西五台县的史料，记载的是科举废除、新学兴起之后，当地百姓的怨言。有人抱怨说，过去考科举读“四书”，一部“四书”传几代，清末兴办学堂后，知识日新，教材常换，对于普通农户而言，光教材费用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，甚至许多子弟因交不起教材费而弃学。张恨水的小说《啼笑因缘》于1930年首次出版，定价两块六，而那年东部沿海省份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十六块钱。换句话说，普通人有条件买书、藏书，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情形。所以，我们有什么理由鄙视阅读背后的经济账呢？从这个角度看，电子阅读当然是巨大的进步，它所带来的最重要改变，就是极大地降低了阅读的成本。诚然，在电子媒介中，阅读或许不是娱乐的首选，但是，只要成本降下来，读者的基数就会不断增加。读者的基数增加上去，阅读的影响与效用才会更大。此外，还有时间成本的问题，也就是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搜集尽可能准确的知识或信息，在这个方面，电子阅读更是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。

没错，阅读确实需要考虑成本、计算投入，我想，这是比焚香净手打开一本精装书的仪式感，或者翻动册页玩味墨香纸纹的闲情逸趣都重要百倍的事情。阅读可以是娱乐，可以是劳作，可以是修炼，可以是积贮，但唯独不该是一种高成本的“艺术”。

双塔

第一次通读《文心雕龙》是刚读研的时候。同门学长告诉我，跟咱老师，首先要读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。果不其然，第一次见面列的必读书单里，首个就是中华书局版《文心雕龙今译》。

说实话，那一次我读得很认真，却并未读懂。虽如初高中习得文言文那般，逐篇认真标注字词解释，但却更加疑惑导师为何将它作为数十年来持续研究的课题。若干年后，我从事了文学工作，开始理解它历经千年岁月而始终为世人所重的缘由。

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，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。正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中多提到的：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。”我们内心的感悟通过语言文字得以呈现，从而构建起与外界沟通的桥梁。“情者文之经，辞者理之纬；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”，情感是文章的经线，文辞是情理的纬线，只有先确立情感，才能使文辞畅达。后世几循此道，从内心出发进行创作，以文字与读者形成共鸣。陶渊明采菊篱落间的悠然，早已化作“心远地自偏”的哲思；李清照帘幕时惊见的绿肥红瘦，至今仍在词章里摇曳着泪光；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，将家族半世兴衰织成大观园的梦影。

细细思量，“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”，《文心雕龙》中对文学的品评和分析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阅读理解经典作品的参考答案：作为读者，广泛阅读、社会磨砺、独立思考，缺一不可。第一次通读《文心雕龙》而不能理解的原因概在于此。我没有大体量的阅读，所以无法形成评判作品优劣的基础，不懂刘勰“风骨”“隐秀”的真章；也因缺少社会背景的介入，无法对作品产生的基础和意义有深刻的体察。看《古诗十九首》只见草木摇落，读《卖炭翁》只觉墨色苍凉，却看不见文字背后那些被岁月弯折的脊梁，看不见刘勰在时代褶皱里埋下的叹息与凌厉的不甘；而阅读与阅历的缺失，更让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去品味作品的魅力，盲目地在各种观点中迷茫着，却寻不见自己阅读理解的那条蹊径。我逐渐明白，《文心雕龙》为何能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坐标。它不是凝固的理论标本，它应在今“识”中焕发新的共鸣。

要知道，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。文学创作，以及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是双生的河流。它们同迎日出日落，时而波涛汹涌，时而风平浪静。流淌间大小河流的汇注会让它们焕发新的力量。如此我们便容易理解了，千年前刘勰在定林寺的烛火下挥笔蘸就的齐梁的风露与自己的春秋，在后世不同人的笔下不断添加着新的注脚，生长出属于当时代的筋骨与眉眼。就像刘勰当年既尊“经诰之正”，亦赞“楚艳之奇”，真正的理解从不是困守于旧识的缠绕，而是决断地重生。每一次解读都应成为一次“操千曲而后晓声”的自我完成。或许这正是刘勰藏在“通变”篇中的深意：“文律运周，日新其业。变则久，通则不乏。”此刻再读，我更意识到《文心雕龙》的真正教益从来不是教会我们如何评判作品，而是引领我们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对自我与世界的重新发现。“文采载心，余心有寄”，文末这句的分量，我方才读懂。

“本乎道”“变乎骚”，创作的真实本身是在阅读中被建构着的。每一部经典都是一面镜子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角度，回想到的是不同的光影，折射着时代的、个体的光芒。这或许就是经典的魅力，它让我们在别人的思考里看见自己的成长，又在自己的生命中读懂永恒的文心。

经典漫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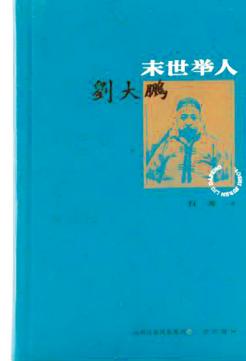
(53)

镜里文心始见雕龙

个体叙事展现历史画卷

——《末世举人刘大鹏》的独特视角

师国宏



《末世举人刘大鹏》书影

幅细致逼真的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图卷。

本质上，传主刘大鹏是一位旧式读书人、乡村知识分子。面对时代剧变，他的思想是保守的，始终以儒家思想道德伦理来要求自己、衡量世界。他作为一位前清举人，留恋着科举入仕的生活，抵触新鲜事物，反对革命党，更不可能主动投身社会革命。但可贵的是，他始终在竭力维持一名读书人的尊严。他曾经出任太原县议会议长等社会职务，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达官贵人，而他宁可做私塾先生，也不到官场里混迹、借机钻营谋求升官发财。相反，他热心地方公益，在担任县志纂修筹备员、古物保护委员会委员期间，不辞辛劳，积极奔走，做了大量保护地方文化遗产的事情，在太原县一带民间赢得很高名望。特别是，他以一己之力，编撰了《晋祠志》和《晋水志》等晋祠地方志书，成为后世难得的乡邦文献。

刘大鹏虽无心为官从政，却从另一个途径实现了他自身的人生价值，造福一方百姓。他坚持52年撰写日记，身后留下了500万字的《退想斋日记》。这部日记时间跨度半个世纪，内容包罗万象，有社会巨变和时代风云掠影，更多是民间日常生活纪事，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微观视角下中国北方近代社会变迁史。所以，作者在书中指出，“刘大鹏对其双亲、自身、妻子、子孙、友人等人的生老病死都有‘详尽而反复’的记述与表达。予意以为，此为目前盛行的‘生命史学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。”

三是作者眼光独特，通过刘大鹏的日记对近代中国华北社会灾害史进行了微观透视。作者作为一位资深历史学学者，清醒地认识到，当前“日渐科学化的历史学往往聚焦于宏大事件和宏大主题，以此展开一般性的社会历史，而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日常体验却往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”。所以，他在研究刘大鹏这个人的时候，选择了一个独特视角，即以人为主体来拓宽灾害史的研究，“以刘大鹏所见所闻所经历为依据，描述刘氏及其家庭半个世纪所经历的日常之灾”。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洋烟之害人甚于洪水猛兽，近又加以泡泡，料料，较洋烟而更为酷虐，虽处以枪决之刑，人犹不怕，犯此罪者接踵不断，此晋人之浩劫也。”日记中关于吸食导致家破人亡的事件记录比比皆是。据本书作者调查得知，刘大鹏去世后，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了瘾君子。刘大鹏一生痛恨吸烟者，此结果可谓家庭悲剧，而所有这些又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。刘大鹏日记，就是对那些不幸遭遇的真实记录。

书中还梳理了《退想斋日记》所记录的近代太原地区的瘟疫之害，简要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灾害史研究的历史，以及取得的成果，对倡导开展“灾害人文学”深表赞同。他认为，“以人为主体，从个体、家庭出发的灾害史可以丰富我们对灾害及其全过程的认识，增强‘同情之理解’的历史意识，也可以更加突显以人为本的历史学本义”。作者对灾害史研究的独到见解，亦是对刘大鹏先生《退想斋日记》社会历史价值的重新评估和发现。

初读欧阳修《秋声赋》，对“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”深以为是。后来，读到林语堂“让我和草木为友，和土壤相亲，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”时，觉得既然草木可以为友，那么再言其无情就有些不妥了。当然两位名人语境不同，感受各异，各自表述都符合逻辑，亦都有其合理性。但在经历了诸多世事之后，我觉得欧阳修所言突出的是人，林语堂所言突出的是草木，而林语堂的感受似乎更有治愈性。

文学如攀登，在新路上攀登一寸，强于在老路上攀登一丈。当然所谓新，也有主次轻重的区别，在这方面我倒比较传统，形式上、语言上和风格上的新鲜，恐怕都不如人物形象的新鲜来得有力。有种说法把文学史比作画廊，这当然是简化了，不过真能为这个画廊增添一个或几个新的形象，恐怕也是作家的殊荣。而新的形象注定无法凭空编造，只能向生活中寻找。

——张学东

犹有黄花晚节香

赵玉兰

近日，作家孙涛老师赠给我一本他近年再版的长篇小说《龙族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)。捧着这本厚厚的小说，油墨香从书中氤氲而起，弥漫进我的脑际，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孙涛老师分享创作经验的画面。正是有了他的指导，九九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前行，共同进步。

20年前，我与老伴徐忠诚一道创办九九文学社。这个文学社的成员，都与我们老两口一样，虽说全都是银发老人，但个个都是充满激情的文学发烧友。大家定期聚会，传看和讨论各自的作品，每个人都心劲十足。两三年过去，大家似乎已经不满足于在报纸上发表“豆腐块”文章了。不是说“黄花晚节香”吗？我们这些老年人都想写出大作品，都想结出大成果。我带头，写出几篇小说，就想邀请孙涛老师来指导指导，给大家助助阵、打打气。

九九文学社的成员们对孙涛老师并不陌生。孙老师是太原市第四届和第五届作家协会主席，退休后，仍担任太原市第六届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。他的作品很多，在长篇小说领域成就斐然。1999年，孙涛老师又奋力一跃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《龙族》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该社“小说界文库”推出。一经行世，便好评不断。

孙涛老师退休后，每天上午要去报社评报。接到我的邀请后，他当即请了假，准时来到我们九九文学社，给大家做了一次诚恳的文学漫谈。孙涛老师以《龙族》为例，讲长篇小说的发展变化；讲如何塑造文学人物、如何结构作品框架；讲自己在创作《龙族》的两年多时间中，与书中各种人物情感交融，在心底为他们的爱与恨、悲与苦纠结，熬神费心。

孙涛老师讲得动听，我们这批老年文学发烧友听得动心。特别是我，刚写过几篇小说，多么想体验一下孙涛老师的那种写作甘苦啊！但是，在漫谈快结束时，孙涛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提出了建议：老年朋友以文学写作养老怡情，是一种锻炼心智的健康的晚年生活。吟诵古诗新歌、谱写散文随笔、创作一些文字不多的短篇小说，都可以，最好不要去写长篇小说。原因只有一条，写长篇小说成功率较低，老年人陷入其中非但不能养生怡情，反而极易劳心伤神，对晚年健康不利。

孙涛老师谈文学、话创作，更是给我们九九文学社的老年文学发烧友指方向、定路径。之后，我们经常邀请孙涛老师指导创作，他毫无保留地分享心得。一年又一年时光流逝，我们九九文学社成员的文学创作，在诗歌、散文、短篇小说和随笔杂文上硕果累累，没有好高骛远走弯路，与孙涛老师当初的建议不无关系。

思绪回到《龙族》上。这部长篇小说1999年出版后，第二年即再版。2018年，山西省作家协会与北岳文艺出版社联袂组建“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”，《龙族》入选并推出一版。2021年，又再版。至此，孙涛老师这部长篇大作，已经由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并再版。和时下一些作者自费出版图书不同，若书籍滞销，没什么读者购买，出版社是绝不会再版发行的。由此，可掂出这部作品的分量，证明它是受到读者认可的。

还没有开始再次品读手中的《龙族》，已引发出上面这些遐想。我想，当我再次认真品读完《龙族》，一定会生发出新的感想和思考。